

# 人品風範堪緬懷

## 追念李新魁先生

麥 耘

中山大學



1997年9月13日晨5時50分，中山大學教授李星橋(新魁)先生在廣州逝世。消息傳出，學界震悼。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中國語言學會聯署的唁電說：「李新魁教授是國內外有影響的著名語言學家，他一生治學勤奮，廣博精深，在語言學的諸多領域均有很高造詣。他教書育人，桃李芬芳；刻苦著述，成果卓著；寬厚待人，廣結同道；人品風範，足堪緬懷。」

星橋先生於1935年10月出生在廣東省澄海縣縣城的一個書香之家。他從六歲開始在同鄉著名學者黃際遇先生的家塾裏讀書，讀的是《四書》、《五經》等，又閱讀了家中收藏的大量古書以及一些當時的新式文學書籍。十二歲時，他進入正規小學念

五年級；1950年畢業後，考入澄海縣第一中學。念初中三年級時，他開始寫詩，主要是白話詩，受到語文老師的激賞，遂一發而不可收，完全迷了進去。在高中期間，他負責編輯學校的黑板報《澄中日報》，經常在上面發表詩作，因而得了「詩人」的綽號。後來先生在大學裏教書，他的中學同學還都以為他是搞文學創作或者文學研究的。

1955年9月，先生考上了中山大學中文系。入學之初，他也曾幻想當個文學家。然而旺盛的求知欲使他很快對語言學產生了興趣，對用剛剛學到的語言學知識分析自己的家鄉話潮汕方言感到新奇和興奮，於是就投入了像原來對文學一樣巨大的熱情。讀二年級時，他寫出了專著《潮州話研究》，當時還有一家出版社準備出版，這對他是個極大的鼓舞，成了他人生道路的轉捩點。只可惜的是，此書後來因故未能出版。1957年，為配合推廣普通話的工作，與人合作寫了《潮州人學習普通話手冊》，並於次年出版。同時又在《中國語文》等雜誌上發表了好幾篇研究潮州話的論文。1958年暑假，先

生與同班同學、後來成為著名古文字學家的曾憲通一起，自告奮勇為教育廳做「推普」工作，跑到粵東好幾個縣裏辦普通話訓練班，情緒非常高昂。

先生學習音韻學，最初是為了方言研究的輔助。1957年從方孝岳學習語音史，主要興趣於是轉向音韻學。方孝岳是對先生的治學道路影響最大的一位老師。方孝岳於1957年6月間在先生的一篇習作上批道：「這樣的學習基礎和鑽研精神，又能發現問題，讀書得間，在音韻史方面將來必能有所貢獻。」在當時，先生是方孝岳最為鍾愛的學生；方孝岳的鼓勵，以及他嚴謹的治學風範，對先生後來在學術上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先生畢業離開中山大學後，仍經常利用假日到方孝岳家中請教。後來，方孝岳在「文革」中含冤去世。多年以後，先生還時時用懷念的口吻談起他的這位老師，並曾專門寫過幾篇文章介紹方孝岳的生平、治學方法和研究業績。

先生念大學的那些年頭，特別是後半段，中國處於特定的政治環境中，要專心學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先生抱著抓緊學習機會的念頭，見縫插針地利用時間。在這期間，他養成了博覽群書的習慣，整架整架地閱讀系資料室的藏書。二十多年以後為他獲得很高聲譽的《韻鏡校證》一書的主要內容，就是他在1959年初至1960年間寫出來的。

1959年夏，先生大學畢業，分配到廣東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講授「現代漢語」。1960年，廣東省教育廳決定制定廣東境內幾種方言的拼音方案，其中潮州話拼音方案由先生負責起草。差不多同一時間，他參加撰寫《廣東方言概要》，負責潮汕方言部分，並負責全書的統稿工作。可惜此書後來未能出版，經過「文革」，書稿已不知下落了。1962年，先生調到暨南大學，仍教「現代漢語」。1964年9月至次年2月，到天津南開大學從邢公畹進修「漢語語音史」。在聽課之餘，他幾乎把京、津兩地的大學和地方圖書館盡數跑遍，閱讀了大量音韻學書籍，準備寫一本《韻學論著總目提要》。此書雖然終未寫成，不過當時收集的資料，在十多年後他撰寫《漢語等韻學》，以及與學生合寫《韻學古籍述要》時，卻派上了大用場。在這期間，他接觸到西夏文的資料，開始在完全沒有人指導的情況下研習西夏文。

從大學畢業到1965年這段期間，先生發表了一些音韻學、方言學以及有關民族語言的論文和普及性（包括「推普」）的文章，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參加關於《中原音韻》性質論爭的論文。1964年間，寫成《古音概說》的初稿。

1965年，先生跟許多大學教師一樣，被派下鄉參加「四清」運動。接著是文化大革命，人心動亂。但在初期的恐慌過去之後，先生又悄悄地繼續做自己的學問。文革後他所出版、發表的專著和文章，不少就是在這個時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寫成的。1968年底，他和大家一道被指令到農村幹部學校勞動。1970年，暨南大學被取消（文革後恢復），他調到華南師範學院（現在的華南師範大學），仍在幹校，至1971年回校參加所謂「教育改革」。1973年底，調到母校中山大學，改教「古代漢語」。從1975年開始開設「漢

語音史」課程，並編寫了講義，這成了後來撰寫《漢語語音史》的基礎。

文革以後，先生著述甚豐，至目前為止，已出版著作(含論文集和工具書)二十三種(1958年出版的一種未計入)，計有：

1979年，《普通話、潮汕方言常用字典》、《新編潮汕方言十八音》、《古漢語基礎知識》(合作)三種；1980年，《古音概說》(此書於1985年和1988年出版了兩種臺灣版，1990年在韓國出了韓文版，書名作《中國聲韻學概論》)；1982年，《韻鏡校證》；1983年，《〈中原音韻〉音系研究》、《漢語等韻學》、《漢語文言語法》三種；1986年，《漢語音韻學》；1987年，《古代漢語自學讀本》；1988年，《香港方言與普通話》、《廣州人學講普通話》(合作)二種；1989年，《類別詞匯釋》；1990年，《成語典故彩圖辭典》(合作)；1991年，《中古音》、《實用詩詞曲格律辭典》二種；1992年，《潮汕方言詞考釋》(合作)；1993年，《李新魁自選集》、《韻學古籍述要》(合作)二種；1994年，《李新魁語言學論集》、《廣東的方言》二種；1995年，《廣州方言研究》(合作)；1996年，《廣州話音檔》(合作)。另外還有未面世的《普通話語音史》、《漢語語音史》、《李新魁音韻學論集》、《潮汕方言詞典》(合作)、《香港人學習普通話詞匯》(合作)、《廣州市志·方言卷》(主編)等數種。

按照先生自定的嚴格標準，他所發表的學術論文約有八十篇，另有語文知識普及性文章、評介文章、序跋、學術會議總結報告等二百三十餘篇。這樣的成就，自然贏得了海內外學術界的矚目。值得特別提到的是，他的自選集是在全國範圍內選編的《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叢書十本中的一本。

先生擔任過多種學術團體的領導職務。1979年，中國民族語言學會成立，他當選為理事(連任三屆)。1980年，他發起成立中國音韻學研究會，並當選為理事、副會長(連任五屆理事；連任兩屆副會長，至研究會決定取消副會長一職為止)。1981年，全國高校文字改革學會成立，他當選為理事。1984年，當選為中國語言學會理事(連任四屆)；1991年，更當選為常務理事(連任兩屆)。1986年，廣東中國語言學會成立，他擔任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連任三屆)。1988年，他有鑒於傳統「小學」需要多學科交叉、聯繫、綜合起來研究才能有新的突破，又發起成立廣州國學研究社，任社長。

先生1959年開始當助教，至1979年才升為講師，其中原因不言自明。1981年升為副教授，1985年升為教授，1994年獲博士生導師資格(內地的博士培養制度跟香港是不同的)。1983年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1990年到日本大東文化大學、1992年到臺灣中山大學、輔仁大學等校講學，為促進內地與香港、臺灣和中日之間的學術交流作出了貢獻。

先生在語言學上的研究領域相當廣，包括音韻學、方言學、文字學、古代漢語語法和詞匯、少數民族的語言和古文字等。

漢語音韻學(漢語語音史)是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在等韻學方面，他對「等」的起

源提出了獨特的看法，針對向來的「等」專為韻母分類而設的觀點，認為它最初是對聲類的分類，後來才擴展為對整個音節的分類，而中古韻圖的分等仍是聲韻並重；對歷來認為難解的等韻門法作出了明晰的闡釋；詳細地研究了一些重要的韻圖；對眾說紛紜的「內外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漢語等韻學》一書資料非常豐富，介紹了許多未為學界熟悉的韻圖，填補了重要的空白。在近代音方面，他不同意《中原音韻》表現元代大都音、入聲已消失的觀點，認為此書表現的是以洛陽音為主體的河南音，是元代漢語共同語音的代表，並認為這個音系仍存在入聲；主張近代時期的知、照組聲母讀為舌尖後音，且能與[ŋ]音相拼；對近代漢語語音史作了較全面的梳理，並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他的《〈中原音韻〉音系研究》是《中原音韻》研究最為重要的文獻之一。在上古音方面，他論證曉、匣母上古源自見、溪、群母；為上古聲母擬訂硬音、軟音、圓唇化音和卷舌化音，而認為上古無介音；提出上古音系中有收[-ʔ]尾的一類韻母，即「次入韻」；分上古韻部為三十六個，主張一部中可以包含二至三個略有不同的主要元音；把上古聲調分為甲（相當於中古的平聲和入聲）、乙（中古上聲）、丙（中古去聲）三類。在中古音方面，認為《廣韻》包含古音和方音成分，主張以《廣韻》為主要資料，參照宋代其他語料來擬訂中古音；對中古音研究中最為複雜繁難的「重紐」問題作了多角度的探討，提出重紐兩類和普通三等韻在較早期可配為一個個「大韻」，並認為重紐B類的聲母帶圓唇化；論證《切韻》中牀、禪兩母無對立；對《廣韻》音系作出了不同於前人的擬構，在擬構中特別重視圓唇元音的作用，如以元音圓唇與否來區分「真假合口」，即開合分韻如「魂」、「痕」中的合口魂韻主要元音為圓唇；認為輕唇化的條件之一是真合口，即主要元音為圓唇。他還寫了一些談音韻學應用的文章。先生研究韻學的一大特點是：對各個分支學科、對漢語語音史的每一時期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而收相輔相成之效，從而更能從總體把握語音史和語音發展規律。

先生在方言學方面的研究重點是潮汕方言，編有好幾種工具書，發表了不少討論潮汕話語音、詞匯、語法的論文，在潮汕話本字考釋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他也研究粵方言，寫了一些論文，並於1987至1988年間主持廣州市地方志方言卷的編撰工作，領導調查了以前未受方言學界注意的廣州市郊的語言狀況。他非常重視對方言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作研究。在推廣普通話方面，先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先生對古代漢語語法有詳盡的描寫，且有不少新穎獨到的見解，如「詞類活用」問題。在古漢語詞匯方面，他專門研究了「類別詞」，作了全面的搜集和分析。文字方面，他分析了「互體字」，對「轉注」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也考釋了一些單字。他所編的《古代漢語自學讀本》既不乏新見，又能照顧學習者的水平，編排也相當合理，深受讀者歡迎。

在少數民族語言方面，先生研究潮安地區的畚話和古代黨項族的語言西夏語（唐古特語）及西夏文字。

本文作者曾寫過《李新魁先生及其學術成就》一文，是在與先生進行專訪式的詳談後寫成的，初稿也經他審閱、修改，可以說相當於他本人的自述。現在把其中評述他學術特點的段落轉引在下面，作為對他治學方法的一個總結：

李先生做學問注意三條原則：

第一，精專和廣博相結合，認為既要立足於專門的研究，又要有較廣的知識面，後者為前者服務。李先生的主要研究學科是音韻學，但他對語言學的其他領域也非常重視。例如他認為搞音韻的人也應搞方言，這會對音韻學的研究有極大裨益，這一點他除自己身體力行外，還常囑咐他的學生分一些精力研究方言。他的視野還越出語言學之外，對文學、歷史、經學等各方面的材料都加以留意。他平時喜歡瀏覽各種圖書，從中攝取有用的知識。例如他提出宋元時代的共同語語音是以當時的中原之音為標準音的觀點，其中許多有力的證據就是在通讀《詞話叢編》時發現的。音韻學內部也有分支，李先生研究的重點是等韻學和近代音，而對中古音和上古音也著力不少。他認為若把自己局限於一點，研究就很難深入。

第二，對材料的分析和理論上的探討相結合。學者們做學問，各有不同的風格，有的人傾向於重視材料的收集和排比，有的人更強調理論對研究工作的指導作用。李先生主張先廣泛搜集材料，特別是要善於發現新材料，就材料本身加以分析，而不為成說所拘；如果材料與流行的理論衝突，就決不讓材料遷就理論。如他寫《漢語等韻學》之初，對一般所說「等」的概念並未產生懷疑，後來發現許多材料與這種說法不相吻合，經反覆思考，便提出自己的新見解。他還常對學生說，對那些跟自己的觀點、理論有齟齬的材料，不要諱言（他談諧地稱為「反貪污」），而應正視。這不但體現了他磊落的學風，也可見他對材料的重視。他又認為，材料若不是最終統以理論，就不免流於細碎、煩瑣，底層研究的價值就得不到提升。對音韻學的研究，他特別強調要有「史」的眼光，在作斷代的、局部的研究時，要總想著漢語史是一個連續的整體，這樣才能把自己的研究提高到能夠把握語音發展大勢的高度。他常說，他的老師方孝岳先生最講究「大勢」；把握了大勢，才不會被材料所淹沒。新的見解往往一方面建立在新的材料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建立在新的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兩者不能偏廢。他常告誡學生，不要寫那種只會堆砌材料，而提不出自己看法的文章，更不要寫那種只拿到一點材料就迫不及待地用一些理論來大加發揮的文章。

第三，細水長流的積累和集中的專題研究相結合。有一些研究專題往往需要在一段較短的時間裏集中力量攻關，但有的專題就非要有較長期的積累不可。常有這種情況：零星的材料經過日積月累，到一定時候就變得很可觀，形成一個基

礎，再在這個基礎上集中時間和精力，有目的地找材料、作研究，就能出成果。李先生為寫《漢語等韻學》，利用各種機會，把國內重要的圖書館幾乎都跑遍了，一點一點地收集資料；《韻學古籍述要》中的材料，有半數以上是靠長期積累而來的。李先生有隨時隨地做卡片的習慣，像《類別詞匯釋》和《潮汕方言詞考釋》中的材料，幾乎全是來自一大堆隨手寫就的卡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長春〕1993年第6期，頁43）

先生不僅學問做得好，課也講得好。他初到中大中文系時，被安排教外系（歷史系、哲學系）的課，因教學效果好，後來轉教本系的課程。聽過他課的學生，都會記得他講的課既深蘊知識，又清晰而有條理，且從無半句廢話，幾乎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八十年代，音韻學研究會舉辦過多次研究班，先生在這些班上開過多種課程。他的講課固然為學員打開了一道道通向語言研究的門扇，而他在講壇上的丰采，也至今讓很多學員難以忘懷。

先生生性熱情隨和，同時又正直耿介，雖然他得罪過人，甚至有些還得罪得很厲害，但他往往也正因此而跟學界大多數同仁保持良好的關係。除了同輩人，語言學界的一些長者樂於把他視為忘年之友，而他與年輕人也總是相處融洽，從沒有名家的架子。他的學生們，以及許多沒做過他學生的後一輩語言學者，都曾感受到他那令人如沐春風的關懷和教誨。他在學業上對學生訂出的標準是嚴格的，但從不要求學生追隨自己的學術觀點，相反，他總是鼓勵學生要敢於提出與老師不同的看法，熱切地希望學生能走出獨創的道路。他不僅以學識，也以這種大家風度，贏得了受業者的敬重。

1993年下半年，先生發現患膀胱癌。1994年初做手術，手術恢復良好。病後初癒，他不顧勸阻，又全力投入工作。他給本科生上課、招研究生、撰寫論文、出席各種學術會議，還張羅組織編寫《廣東方言大字典》。1996年下半年，舊病復發，腎臟受損，他仍堅持做完與學生合作的《潮汕方言詞典》的掃尾工作。1997年2月，他精神稍好，就到汕頭去參加學術會議。會後，他最後一次暢遊了他一生熱愛的故鄉。回穗後，病情開始惡化，於4月間和6月間兩度入院。而在兩次住院之間的半個月裏，他竟強支病體，用十天時間寫完了《普通話語音史》的結尾部分。在最後的日子裏，他仍念念不忘系裏語言學科的建設和學生的博士論文選題等，多次向前來探望的同事和學生談起。他真正正把畢生獻給了學術。